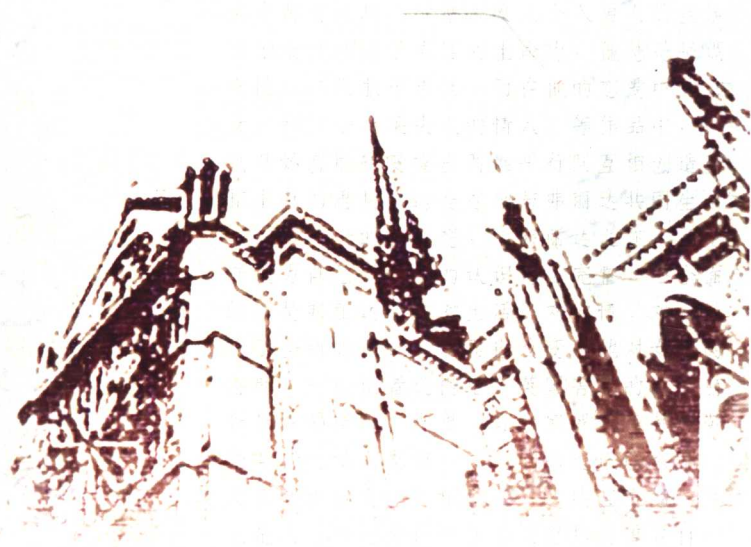


人性的回归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作品研究

万莉 著



新华出版社

人性的回归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作品研究

万 莉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回归: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作品研究 / 万 莉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5011-8137-7

I. 人… II. 万… III. 劳伦斯, D. H. (1885~1930)—文学研究 IV.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7022 号

人性的回归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作品研究

主 编:万 莉

责任编辑:翟福军 王 丽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aupub.com>

邮 编:10004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黄河彩印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0.25

字 数:176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137-7

定 价:18.00 元

(本书封底贴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均为盗版)

前 言

英国小说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1855—1930)在20世纪西方文坛上很有地位,但又有争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劳伦斯的出现,对20世纪的英国文坛是一场强烈地震,只是余震过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它的震动之猛和影响之深。”(见侯维瑞著《英国现代小说史》)他的作品大部分已译成汉语,在我国有一定影响。我国对劳伦斯的介绍和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不幸中断半个世纪后,我国读者终于发现,劳伦斯对人类关系及心灵的洞察,对美好未来的展示,以及他那气势磅礴的艺术,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劳伦斯的一大贡献是对英美社会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由保守陈腐风尚,向宽容、开放的现代社会过渡起了催化作用。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众思想观念向现代意识的转变可以从劳伦斯的作品中得到借鉴。

劳伦斯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共写出了10部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50多篇短篇小说。近年来,我国有些学者指出:劳氏的作品是心理探索与社会批判的结合。这个结论是否有些武断和简单?在劳氏的作品中,女性多半是主角,在他的妇女性画廊中,一个个卓然超群。而对这些女性形象的系统综合性研究尚为少见。

劳伦斯与众不同的精神历程,作品中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以及那狂热的、宗教祈祷般的语言,那语义闪烁、瑰奇幽奥的一串串意象……都在向我们暗示着一层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宗教学的乃至人类学的丰富内涵。这些都值得我们潜心探讨与研究。

纵观国内各方面的研究文章,劳伦斯研究大体可分为从“文本”出发、从作者出发、从读者出发(包括所有评论者)这样三大类。从“文本”出发者,抛开所有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及作者个人的信仰、宗教、经历等等,研究作品的各种形象符号的象征、寓意,语言的风格、特点,作品的结构模式,文体性等等。国外的文本研究有的已深入到同一部作品的两部手稿之间的差异比较,国内当然还没有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关于劳伦斯的创作方法究竟归属于哪一类,这始终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他无疑属于现代主义作家,有人说他本质上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观念上看,劳伦斯的观念显然是最具现代意识的,超越时代的;从单纯的创作方法看,他虽然有许多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的表现,但作品的主流、基调应该说还是现实主义的。他在结构的布局上仍保持着许多传统的特点。劳伦斯在语言和文体上主要的表现方式仍是古典的。仅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他的作品,从学习语言的角度阅读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

第二类研究是从作者本身出发,通过研究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他的家庭、文化背景,研究他的父母、妻子、情人、朋友对他思想观念、哲学观念及世界观诸方面的影响。

例如早期的劳伦斯,由于精神上深受母亲的影响和束缚,始终不能完成自己健全的人格,不能全身心投入对异性的正常感情中去,他的代表作之一《儿子与情人》就是写的他的这段感情生活的历程,那是痛苦、分裂的精神生活的写照。很多人通过研究劳伦斯早期生活和他的家庭来研究《儿子与情人》这部作品。这一研究又可归为精神分析。

尽管劳伦斯声称自己没有读过弗洛伊德的书,但他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常有不谋而合之处,只不过劳伦斯是用形象表达自己的思想,弗洛伊德则用的是科学的语言。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是弗洛伊德的信徒,在这一点上,她对劳伦斯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劳伦斯很恼火人家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他的《儿子与情人》。

早期的劳伦斯是个男性中心的提倡者,这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有反映。他憎恨女人介入男人的生活。害怕女性扼杀了男性的生命力,他总是强调女性应该臣服于男性。而在他的《恋爱中的妇女》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中,他则开始有所转变,提出两性平行同步、互相创造、互相奉献的思想。这是在他与弗丽达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新思想。在弗丽达之前,劳伦斯认为自己对女性的认识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是弗丽达使他对生活、对爱情、对女性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也改变了他对女性的态度。

一些论者还提出:英国著名的作家赫胥黎、福斯特、默里、哲学家罗素等都与劳伦斯有过私人友谊,在他们的通讯联系中,大家互相启发、互相滋养。这些宝贵的信件也是人们研究劳伦斯作品及思想的重要材料。

还有的人把劳伦斯全部创作的发展过程视为他一生经历的某种象征,认为劳伦斯无论是在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都在寻求一种人性的复归,他在现代文明的沙漠中寻找着人间的伊甸乐园。康妮和梅尔斯的大森林就是他和弗丽达的理想王国。

第三类研究主要是接受者对作品的各种理解、注释、挖掘和发挥,这一类见解内容最为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有评论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把劳伦斯的作品与中国古典小说《金梅瓶》比较,也有的把他的作品与当代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相比较,认为在本质上,劳伦斯的立意较高,因为劳伦斯破除了男人对女人性奴役的思想,提出了两个行星并行的观点。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首先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各自是对方的另一半,不是玩物、不是奴隶、也不是工具。他们是互相创造、互相奉献的关系。

也有的从宏观角度比较,把劳伦斯的两性关系的调整、协调的观念与中国道家阴阳互补、阴补阳、阳补阴的观念进行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同时还有各种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对我们理解劳伦斯的思想颇有参考价值。

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性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这也是劳伦斯研究中重要的一支。历来西方文学的爱情模式是“英雄加美女”,东方是“才子佳人”,劳伦斯抛开了所有这些生动爱情神话,他写的是纯粹的男人与纯粹的女人的故事,歌颂的是自然人与自然人的爱情。

关于劳伦斯作品内容方面的评论,论及最多的是他关于文明与自然的思想,他认为大机器生产和现代的所谓文明压抑和扭曲了人性,使人从精神到肉体都处于分裂萎缩状态,因而人不能全身心地投入任何活动中去,人这种不死不活毫无生气的状态就像一个被阉割的行尸走肉。因此劳伦斯极力主张人要回复生命活力,就必须回归大自然,要返璞归真。

事实上这一观点并非劳伦斯的发明创造。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法国的卢梭,其次是19世纪的浪漫派作家们和俄国的托尔斯泰。他们都倡导回归大自然保持人的天真与淳朴,只不过每个人的药方不一样。卢梭寄希望于建立一个理性的王国;浪漫派们希望回到中世纪;托尔斯泰指导人们读福音书;劳伦斯则呼吁人们在性爱中寻求生命的复活。他们在抨击现代文明的同时忽略了历史是不能倒退的,历史进程中的丑恶也好,弊病也好,都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远远不是用道德化的是非标准所能囊括的。

不少评论家指出：劳伦斯最大的发明不在于他认识了文明的悲剧，而在于他的关于性爱的理论，这是他作为文学家对人类文化独特贡献。劳伦斯期望通过建立和谐、健康的性关系来对抗堕落的现代文明社会，这固然不可能。但劳伦斯的性爱理论毕竟有不少合理的因素是值得肯定的。

评论家也注意到：劳伦斯有自己的“贞洁”概念。他认为贞洁不仅是对女人单独存在的，而是对男人和女人都具有意义的一个概念。贞洁与否在于人们是否忠于自己的内心的情感。是否屈从任何物质的利害的需求。

研究劳伦斯，弄清什么是色情，什么是严肃文学，对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的素质，对加强年轻一代的道德修养和责任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劳伦斯曾说：“三百年内，没有人会理解我的作品。”他太悲观了。他又说：“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未来一千年的历史进程！”他似乎又太狂妄了。

《人性的回归》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劳伦斯的几部主要作品，探讨了劳伦斯的“妇女观”及“双重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在分析劳伦斯创作过程的基础上，讨论劳伦斯的作品主题：人性的回归。本书旨在读者能对劳伦斯及作品有一个全面、客观的理解、评价及欣赏。

目 录

序	(1)
一、劳伦斯的世界	(11)
1. 生平与创作背景	(11)
2. 创作的主题与倾向	(15)
3. 潜意识的影响	(16)
4. 继承与跨越	(19)
二、劳伦斯与女性	(24)
1. 劳伦斯“妇女观”的形成与发展	(24)
2. 劳伦斯及作品的启示	(29)
三、拯救人类的“希望”——劳伦斯“双重性”理论简述	(44)
1. 毁灭与希望——“凤凰”再生及意义	(44)
2. 完整性与特异性——劳伦斯双重性理论的特点	(46)
3. “虹”的光彩与爱的理想——“个性”的存在及其作品主题	(47)
四、劳伦斯主要作品中的女性人物	(50)
1. 劳伦斯的精神自我成长与“柏拉图式”恋爱的关系——《儿子与情人》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评析	(50)
2. 女人和爱——《恋爱中的妇女》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评析	(57)
3. 人类情感的历险——《虹》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评析	(63)
4. 追寻彩虹的女人——劳伦斯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发展	(69)
5. 失落的伊甸园——劳伦斯和哈代作品中女性人物对比分析	(77)
五、劳伦斯的创作观:寻求复归	(85)
1. 审美视角的内向化	(85)
2. 情节的淡化与暗示性	(86)
3. 象征的神秘性	(89)

4. 人性的异化	(90)
六、劳伦斯的语言	(100)
1. 文学的语言与语言的变异	(100)
2. 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	(105)
3. 现实主义的扬弃	(111)
附录 劳伦斯文艺随笔选	(118)
道德与小说	(118)
小说何以重要	(123)
纳撒尼尔·霍桑与《红字》	(128)
论淫秽与色情	(142)
参考文献	(153)
后 记	(155)



远离尘世的神秘天地



提起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人们就会联想到他的小说中的那些性描写以及因此在文坛内外引出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种种纠葛。的确,劳伦斯作品中有不少性描写,但有关文字并不一定是为了标新立异,他的着眼点总是在艺术。尽管如此,有关文字还是吸引了很多读者的注意力。但与此同时,对劳伦斯丰富复杂的艺术创造本身以及深刻的思想全貌,他们反倒很少问津。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只能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劳伦斯。但是,事实上,劳伦斯是一位十分严肃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虔诚的作家。他在其作品中对工业社会提出强烈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改善社会、改善人的境遇的两种大取向:一是他提倡原始主义,即人向自然复归;二是他试图以完美的两性关系这种形式探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的可能性,进而改造社会、改变人性的最终目的。可以想见,他充满梦想色彩的“改革方案”是根本不切合实际的。但劳伦斯不是政治家,而是艺术家,他对世界的把握不是靠观念和理论,而是靠审美的情感。因此,我们不能指望从一个作家或他的作品中,找到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钥匙。值得指出的是,劳伦斯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评论劳伦斯时指出:“他并不附和任何人,也不继承任何传统,他无视过去,也不理会现在,除非影响到将来。”劳伦斯开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他的作品主题意蕴涵盖广博、气势宏伟,其中富于诗意的叙事描写,既表征真实同时又属象征的各种形象,写意与写实的浑然一体,激情充溢的议论,朦胧的诗思,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探讨。

工业文明与人的天性、与大自然的冲突,是现代主义作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就劳伦斯本人而论,也自有其身世背景与时代背景。他的出生地英国诺丁汉郡

斯特伍德,就处于矿区和乡野的交叉点上。隆隆的机器声,声声入耳,拖着疲惫的步子下班的矿工,日日可见。杂乱的井架与乡野清新的气息,生机勃勃的花草树木与雪地上狐狸的脚印共存并生,和谐之中隐含着某种冲突。正如劳伦斯在《诺丁汉与矿乡》一文中所说,他的家乡是“工业化与莎士比亚、密尔顿、菲尔丁及乔治·爱略特的古老农业英国二者的奇特杂交。”工业文明和大自然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尖锐对立,给劳伦斯的心灵以极大的刺激。从这种对立中,他强烈感受到大自然的幽静美丽,感受到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侵蚀破坏,以及工业文明作为异己力量同正常人精神生活的冲突。日后趋渐成熟的劳伦斯丰富复杂的思想的须根,就扎在早年对这尖锐对立的直观感受中。工业文明和大自然的冲突,就成为劳伦斯作品中一切冲突的基础。

作为对立的一方——大自然,对劳伦斯有特殊意义。劳伦斯的个体生命,可以说是在对自然之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度过的。他的足迹,踏遍了世界各地。每到一处,最先吸引他的,总是那里的自然景色;促使他离开那里的原因,也和厌倦了彼地的自然环境有关。这种近乎痴迷的“自然情结”,文学史上恐怕也只有列夫·托尔斯泰能与之相比。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对大自然的描写才显示出非凡的艺术功力。在作品中,大自然是以其原始、纯真、合乎人性的特性,成为与工业文明相抗衡的正义力量,提示着理想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存在。比如《儿子与情人》中米丽安家农场迎风晃动的樱桃树、荒蛮的山野和古遗迹,《虹》中横架天空的彩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那片与世隔绝的树林,都包含着这样的意蕴。

作为冲突的另一方——工业文明,劳伦斯则给予了痛切的批判。这种批判,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就开始了。《儿子与情人》对工业文明的批判,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以煤矿的迅速崛起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侵蚀了农田,破坏了优美的自然景物;工人躬腰屈背在几千米深的井下像老鼠一样没日没夜地劳作;人的精神被扭曲,变得呆滞、粗暴、蛮横,两性之间也因此失去了温暖和谐的情爱。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劳伦斯是最早超越从贫富的差别、阶级对立的传统视角批判工业社会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他看到的是,大工业发展对人类精神的扭曲和摧残,以及对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两性关系的破坏。

工业文明和大自然,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劳伦斯作品的艺术构成,在作品中,它们处于绝对的冲突状态。短篇小说《菊馨》开场就展示了两组对立的画面:

一组是迎面开来的火车,钢铁的碰撞声响震耳欲聋,气势汹汹。而在它背后,是红光舔食着的井口及黑沉沉的轮机和怪物般的烟囱。另一组是小马在花丛中悠闲地吃草,小鸟和鸡群在树上树下嬉逐游戏。冲突力量对比的变化,暗示出人物不同的结局。《菊馨》中火车的闯入打破了大自然的和平与宁静;与此同时,一个女人的丈夫在矿井事故中不幸遇难。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劳伦斯并没有回复到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传统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模式。他要展示的是工业文明造成心灵异化、两性关系紧张,而与此趋向相反的大自然则可以使人心、人性得到净化,并使有望获得再生的过程。在他的作品中,工业文明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底线和社会背景,从理论上提示着与两性关系的冲突及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建立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和人物命运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较之传统小说,20世纪“小说进展的动力发生了变化,即从表现自我的两极对立变为集中表现自我。”劳伦斯小说表现的主体,正是已经扭曲的两性关系的自足运动中的主体。

劳伦斯的身世,可以为我们提供他之所以关注两性关系探索的背景材料。他曾回忆说:“我母亲出身古老的苏格兰世家……她下嫁给我父亲……他是个工人。”不同的身世和教养,使父母间充满了“流血的斗争”,导致母亲把本应属于丈夫的爱情转移到孩子身上。用劳伦斯自己的话说,他和母亲“彼此爱着,几乎像丈夫跟妻子一样爱着。”在母子恋情关系中的第三者,是杰西·钱伯斯。很久以后,劳伦斯提起这段往事仍心有余悸,说他的第一个恋人“要求占有他的心灵。”占有,是劳伦斯所深深厌恶的。他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令人窒息的母爱牢牢控制着劳伦斯,阻止他和任何女性交往。以这样的实际生活为蓝本,他写出了《儿子与情人》。对影响了他一生的这段生活经历的深刻反思,又促成了《虹》、《恋爱中的妇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

劳伦斯从两个方面展开两性关系的主题:对畸形两性关系的鞭挞,以及对理想两性关系的追寻。

劳伦斯反对精神之爱,这里讲的“精神”,不是我们日常习语中指的“心灵相通”、“心灵交流”之类,而是指负面意义上的性反应冷淡,厌恶性行为的情爱方式。这一点在《儿子与情人》中女主人公米丽安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虔诚、圣洁的姑娘,她爱保罗,但却躲避肉体的欢恋,试图把保罗引进精神的王国。

即使她最后委身于保罗,也是出自理性的需要而不是自然本能的冲动。劳伦斯并不把情爱中对性行为的回避视为道德修养的标志,而认为它是一种心理情感特征,因而是和人的天性相违背。保罗终于忍受不了米丽安,两人的恋情最后因此以失败告终。后来,劳伦斯又把精神之爱和知识、教育、理性联系在一起,认为那是文明的恶果——文明使人变得节制、虚伪、矜持,在性方面迟钝、冷漠、缺乏激情,并给予尖刻的批判。《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克利福,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米丽安形象的延续。只是,精神之爱由心理情感特征讽刺性地变成由于外力作用造成性功能丧失后迫不得已的选择。克利福试图超越性爱,与康妮一起沉湎于一种单纯的生活之中,以读书、写作、沙龙及乡野散步等为高雅的艺术享受。这里的背景,是克利福高贵的血统、由冰冷的石头砌起来的府宅,以及昼夜向天空喷吐煤灰的钢铁机械。劳伦斯通过描写,使康妮摆脱了这种压抑、空虚、无聊的生活,并最终投入梅乐斯的怀抱。这样,也就彻底否定了与工业文明难解难分的所谓“精神之爱”。

劳伦斯也反对两性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精神占有。劳伦斯在《论民主》一文中指出:“占有是一种精神疾病,无异于背叛天然的自然。”劳伦斯作品中,塑造了葛楚德、米丽安、安娜、赫米恩、厄秀拉等“强壮的、男性化的、精力旺盛的女人”形象,她们在整个小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也统治着男人。“是的,我们就像一群进出蜂窝的蜜蜂,面对我们的女子时进时退……我们是从鲜花之家飞向蜂窝和蜂王的蜜蜂,她会为全能的上帝和造物主挡住了蜜蜂的去路。”人与女人的关系,成了蜜蜂与蜂窝蜂王的关系。难怪人们感慨,在劳伦斯小说里,“女人成了主体,男人的世界成了影子”。正是这些专断、强悍、占有欲极强的女人,她们疯狂得对男性的征服、控制、占有,拉开了两性厮杀、对抗的序幕。

《虹》中安娜和威尔在月光下搬麦穗的场面震人心魄。因为,本来单调的可以“无所用心”的搬麦穗堆成麦垛的重复劳动,竟然在无意中演化成了二人默默的心理较量。安娜在前,威尔在后,威尔想赶上。距离的保持,代表狭隘的女性优势心理的胜利。安娜像一位意志女神,总是想征服对方,占有对方。但精神的占有,带来的则是两性双方的毁灭——“性欲误入歧途”;安娜着迷似的接二连三生孩子,威尔则与其他女人调情,抱着女儿拼命荡秋千寻找刺激。在《恋爱中的妇女》里,赫米恩作为伯金以前的情人,以高傲的姿态、虚假的宽容、夸张的激情与厄秀拉相对抗,千方百计要把伯金据为己有。在种种努力失败后,甚至不惜拿

来镇纸，朝伯金头上猛击。

劳伦斯一生都在苦苦探索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希望“通过调整男女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从目前的萎靡不振中挣脱出来”。从《恋爱中的妇女》里伯金和厄秀拉的经历及对话看，理想的两性关系模式似乎是“两性平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保持各自的独立，又保持双方的和谐的统一，同时突出了两性关系中双方心理感觉上的平衡和谐。也有人认为这种理想模式应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这两种见解，其实都没有透彻阐释劳伦斯的本意。劳伦斯重视的是两性关系中性的自然、畅快的宣泄。理想的两性关系，就是能够保证这种宣泄。劳伦斯宣称：“假使我们的文明教会了我们怎样让情感适当微妙地流动，怎样保持性之火的纯洁和生机勃勃，让它以不同的力量和交流方式或闪烁或发光或熊熊燃烧，那么……我们就能——终生生活在爱中。”读者很难忘记《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康妮和梅勒斯癫狂的做爱场面，它以赤裸的坦诚，引导读者和人物共同去经历那令人激动、兴奋、狂乱、愉悦的过程。这一生命活动所开掘出的人性的丰富、深刻以及人本身纤细的心理感受力，是其他任何活动所无法体现的。它可以在瞬间使人物重新确立对人生、宇宙、人类的信念，抛弃旧我，获得新生。它的神奇力量，还可以使人物产生对肉体的神圣感，近乎肉体崇拜。而这正是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原因，是人性辉煌的显现。劳伦斯认为，没有什么比健康的性爱，更能激发人的美好的天性、活力朝气，更能调节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两性关系。

《虹》的出版，标志着劳伦斯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他在小说叙事中在两性关系的表现方面融入了崭新的东西；与此同时，对死亡与再生的思考——畸形的或理想的两性关系，走向死亡或再生的结局。小说的整体框架也发生变化，出现了死亡—再生整体象征模式。这样的变化，也同样表现在随后创作的《恋爱中的妇女》（1918）、《亚伦的黎仗》（1922）、《袋鼠》（1924）、《查特莱夫人的情人》（1928）、《死去男人》（1929）中。

《虹》中对布兰温家族三代两性关系的经历的描述，恰恰与人类从新生到死亡再到复活的生命历程相叠合。马什农场的大洪水和汤姆的死亡，勾画出的是人类失乐园的图景。远古神话具体化为第一代的遭遇。乘坐着诺亚方舟，第二代登场了，而这是象征死亡的一代。安娜和威尔的两性关系充满了对抗。在惨烈的精神厮杀中，人性中本来可以丰富多彩的激情，被煎熬烧灼得只剩一堆令人丧气的灰烬。第三代厄秀拉担负了走向再生的使命，经历了艰难的探索，终于迎

来了象征新生的彩虹。

《恋爱中的妇女》描写了两对两性关系。杰拉尔德和古德伦走向死亡。杰拉尔德同一系列神秘的死亡事件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幼年误杀弟弟，妹妹在湖中溺死，父亲病死，伯金称他是“一个使者，预告着一切都将在白色和冰雪中消亡”。古德伦是一个游戏人生、任性、自私、占有欲极强的女子，她动不动就与人发生摩擦，易于感情激动，她铿锵如金属般的嗓音，对沼泽水生植物的爱好，都证明她与死亡相联系。这两个死亡的使者，在克里齐家族的婚礼上相逢后，经历了对抗、认同、分裂，最后走向死亡。伯金和厄秀拉则向人们昭示着再生。伯金像一个伟大的先知，对世界进行死亡的判决。他指着肮脏的伦敦大道说：“这是真正的死亡。”他宣称人类是一棵死亡之树，期待着“人类从世界上一扫而光”。他坚信，死亡后诞生，一个新的世界必将在毁灭的废墟上建立。厄秀拉的整个心灵，都向未来敞开，期待着自己能像一粒生命的种子，撒向无底的黑色空间，在新世界的彼岸生根开花。他们两人经过冲突，建立起和谐的两性关系，走向象征人类死亡的雪谷，获得了再生。

两性关系的死亡或再生取向，决不只是标志一般意义上的两性关系的成功或失败，而是沉淀着丰富的人类文化，具有普遍的形而上的意义。因为它是对《圣经》模式乃至佛教凤凰涅槃传说的自觉应用。劳伦斯的作品也因此被称为“启示录”。

显而易见，在工业文明和大自然对立的土壤上培植起来的两性关系主题，经过死亡与再生的洗礼，同对历史长河中的人类命运的思考交汇起来。劳伦斯的思想因此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层次：工业文明和大自然的对立，两性关系是主体，死和再生是升华。三层次之间又有两组对应关系：工业文明造就的扭曲的两性关系被死亡的冥河淹没；与大自然在精神上一致的理想的两性关系则架着彩虹再生。表现工业文明和大自然的对立，即和人的自然天性，人的精神世界的对立，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主导倾向。不过，如果停留于此，就会认为，劳伦斯是在步乔伊斯、卡夫卡的后尘。而实际上劳伦斯已跨出了独特的一步。他以非凡的艺术功力，找到了与时代潮流相应和，又真正属于自己的音响：两性关系。对两性关系的深刻表现，使劳伦斯成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所渗透的死亡、再生意识、不仅没有冲淡对两性关系的探讨，反而使这种探讨超越了“这里”和“此时”的范畴，从写实走向象征，从经验世界升腾到超验世界，从

而获得深广的哲理内涵和普遍意义,成为展示人类走出精神荒原的困顿,走向光明前景的现代启示录。这也就是劳伦斯作品的总体设计和劳伦斯思想的整体图景。



劳伦斯一向被人称为预言家、说教家、先知、传道者。不过,或褒或贬的评论,都可证明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他殚精竭虑,试图以艺术的手法把人类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展现出来。那么,现代人死亡的灵魂,怎样才能再生?复活的具体途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自然成为劳伦斯苦苦思索的重大问题。

可以说,劳伦斯对他那个时代可能有的选择,都进行了尝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的思想最为活跃,也最为激进。1917年那个震撼世界的年代,他和他的俄国朋友科特连斯基频繁联系,热切注视着那里正发生的一切,因为他当时拟定俄国未来正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我一想到那个年轻的新国家,就感到对它无限热爱。”受俄国正在进行的革命以及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主张:“我们将打碎结构,土地、工业、交通工具、公共娱乐将国有化,不管他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有工资,直到他离开人世。只要他能工作时就应工作。”不过,当时的劳伦斯政治思想尚不成熟,常常在各种学说之间游移不定。上世纪20年代,纳粹政权的独裁势力不断增强,而劳伦斯却认为分崩离析的人类社会需要一个领袖进行强权统治,从而招致有法西斯主义嫌疑。曾经热闹过一阵的“拉拉尼姆”计划,也是他种种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理想的乌托邦,设在美国西部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不过,它当然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由于劳伦斯政治思想上的局限性,许多有益的结论最终都被他所舍弃。他毕竟不是革命家,而是小说家。当政治的激情消退之后,艺术家的执著便将他引回与他自身人格特征及其创作的探索一贯密切联系的非理性心理活动上来。他发现,拯救人类的希望,恰恰就在人自身,在于人的心灵本体力量的运动。他深信,“人生之真正的美只在于下意识的纯真状态中”。他一路高歌人的躯体、本能、欲望、血性,即人的非理性心理活动:“我最大的信仰,是相信血性和肉体比理智更聪慧,我们的理智可能犯错误,但我们的血性所感觉到的,所相信的和所达

到的,永远是正确的。理智不过是一具枷锁。我与知识有什么关系?我的全部需要就是直接回答我的血液。不需要理智、道德或别的什么进行无聊的干预。”

那么,按照劳伦斯的设计,在非理性心理驱动下,理想的人的认识方式、情感方式和生存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恋爱中的妇女》里,厄秀拉和伯金相互之间精神追求一致,气质接近,但他们的关系却不是终极性的,而带有很强的随意性。传统小说中两性吸引的过程,是通过双方优秀品质的认识——忠诚、美丽、善良、勇敢等——来实现的。一旦相互了解到一定程度,关系便可以固定下来。厄秀拉却从来不会通过理性对伯金形成一个确定的观念,然后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采取合乎逻辑的行动,即便这个观念的形成不一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厄秀拉相信的是瞬间的直觉、印象,认为那才是真实的。在她看来,直觉中,心灵与心灵才能交融。伯金在她眼里“就是上帝之子,是那些来自天堂的、奇特的造物中的一个。”不过,与此同时,她又“对伯金恨之入骨,”认为“任何人只要与他交往两周,就会无法忍受。”厄秀拉以整个躯体去感悟、体验、交流,不靠抽象的思考,最终获得了再生。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的克利福,如果撇开劳伦斯要把他作为工业文明的代表而强加给他的许多否定性评判不论,单从社会公认的(社会化的)标准(这一标准在任何时代都是有效的)衡量,克利福这个人物是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至少,他不是恶人。他为人忠诚、宽容,意志坚强,而且有高雅的趣味。妻子私奔后,他精神上十分痛苦,但他并没有采取极端的手段去阻止尽管以他的地位这是可以做到的。按照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康妮倒有许多可挑剔之处。少女时代,她就有了性经历(不是出于爱恋)。而她和克利福的结合,并非为人所迫,或没有感情。婚后他们也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克利福性功能丧失后,她的感情发生了转移,先与克利福的朋友幽会,继而和猎人私奔。对这位猎人,除知道他满口土话,孤僻,毫无幽默感之外,康妮还了解什么呢?只几次性关系而已。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若从康妮的情感追求(这也是劳伦斯所肯定的)来看,一切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都是没有意义的。它不能规范康妮的情感流向和选择,当然也不是用它来评价作品中的人物。康妮依据的是她心灵最深处生命本体的呼唤和需求。所以,遭遇压抑、沉闷,尤其是不能满足性要求的生活与本能产生冲突的时候,她在情感上便要背弃克利福,因而不存在任何道德意义上的负罪感。她的血液得到了梅乐斯的响应,梅乐斯就成了她的上帝。她爱他,宁死不渝。这